

关键性他者：孟旦学术谱系的中国形象建构

高艳丽*, 刘子浩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青岛

【摘要】美国汉学家孟旦与其师徒对中国传统儒家叙事进行了深入探索，有必要探明其学术谱系对中国儒家形象的研究以及在形塑过程中体现的功用，本文认为，从他者视角中可以看出中国人以重家庭伦理道德，遵循克己复礼、学而为己以及强调情感价值和维护和谐的君子形象出现，儒家哲学以其仁爱观、道德情感以及进步儒学的形象登场。进而，深陷二律背反境地的西方单向度社会肇因于对立思维，可借鉴于中国智慧，中国人的君子形象和儒家哲学的道德伦理、人文内涵、实用价值、进步意义等可以提供实践样本和范式参照。

【关键词】中国形象；孟旦；狄百瑞；安靖如；汉学家

【收稿日期】2025 年 11 月 19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12 月 3 日

【DOI】10.12208/j.ssr.20250475

The constitutive othe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mage in Donald J. Munro's academic genealogy

Yanli Gao*, Zihao Liu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Abstract】Donald J. Munro is known as an American sinologist, and his academic lineage have conducted in-depth explorations into the narrativ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onfucianism.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examine how his academic genealogy researches the image of Chinese Confucianism and the functions embodied in its construction proces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ther”, the Chinese people are portrayed as a “junzi” (gentleman) image characterized by prioritizing family ethics and morality,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restraining oneself and returning to ritual” (keji fuli) and “learning for one’s own improvement” (xue er wei ji), as well as emphasizing emotional values and maintaining harmony. Confucian philosophy, meanwhile, presents itself through its concepts of “benevolence” (ren), moral emotions, and the dimension of “progressive Confucianism”. Furthermore, the one-dimensional Western society, trapped in the dilemma of antinomies, stems from its oppositional thinking and can draw insights from Chinese wisdom. The “junzi” image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moral ethics, humanistic connotations, practical values, and progressive significance of Confucian philosophy can provide practical models and paradigmatic references.

【Keywords】China's image; Munro; De Bary; Stephen C. Angle; Sinologists

引言

形象学的基本指涉是国家形象，是基于现实传递出的塑造和想象，国家形象构建研究不仅依据传奇故事、诗歌小说等比较文学，同时要涉及游记档案、传教报告、社会文化书写等层面展开，孙有中（2002）认为国家形象不仅包含国内外公众对该国政治经济状况的认识与评价，还包括社会（社会凝聚力、民族性格等）、文化（包括文化遗产、价值观念）等方面。大国崛起不仅需要物质财富的发展，也需要包括大国形象塑造在内的社会性成长，既有本国的自我确认、异域之眼的形

塑，也有主体间性的第三维度（李格琴，2008），即国内外主客体互动交融的社会建构。儒家哲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对提升形象有补益之功，衍生出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是汉学家的研究内容，已有学者关注到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思想体系下儒家文化价值和现代性（邓琳 2021；蔡应坤 2022；刘雷 2022）、孟旦（Donald J. Munro）关于中国文化特质和现代价值的研究（安延明 2009；刘燕 2023），以及安靖如（Stephen C. Angle）对进步儒学的讨论（王堃 2014；黄玉顺 2017），但尚无研究涉及该学术谱系下的儒家

*通讯作者：高艳丽

形象及其功能体现, 因此, 本文拟在该学术团体的研究基础上, 探讨受儒家哲学浸润的中国人具有哪些区别于西方有神论和对立思想约束下的人物形象, 以及儒家哲学以何种形象登场。

1 汉学家发挥的重要作用

西方基于先入之见和预设标准, 按照自己既定的价值观进行判断, 与实际中国形象脱节。乾隆皇帝《敕谕》宣告马嘎尔尼使团觐觐已久的经济特权落空, 是中国形象彻底逆转的标志之一^[1], “理想国”的神圣光环褪去后, 以往盛行于西方的“天朝”、“中华大帝国”形象瓦解, 转向“泥足巨人”、“黄祸论”等丑化论调, 近代西方文学作品曾将中国人描述为中国佬约翰(John Chinaman)、“黄祸论”中的典型人物付满楚(Fu Manchu)、查理·陈(Charlie Chan)等套话(姜智芹, 2004)。尽管有“睡狮”(传统犹太—基督教中举世无敌的角色)的形象隐喻, 以及“伟大国家”的尊称和“友好”、“钦佩”的态度, 但威胁论、敌对情绪、刻板形象此起彼伏、余孽肆虐。美国“冷战之父”凯南(George Kennan)揭露某些美国人总喜欢在国外寻找一个中心, 以便把所有罪责强加于他。长久以来, 源于“修昔底德陷阱”以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认知惯性积弊已深, 需革除这些积重难返的沉痾。

汉学家作为智识群体, 秉持天下观的理念, 具备文化价值理性, 通过基于文化自觉的中国学汉学研究, 实现价值认同的文化传播^[2], 构建出一套关于中国国家形象“他塑”的汉学话语格局, 从而能够以正视听^[3], 通过民族认同、文化认知和表述等方面与汉学家开展国际学术对话、构建共同话语空间、提供国际知识产品, 实现价值观导向的文化扩散, 从而建立、提升、保护良好的国际声誉和大国形象。美国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在《大汗之国》使用纪实文本、虚构表述以及思想理论三方面讨论 13 至 20 世纪以来西方的中国形象建构问题, 对于西方的中国形象为何如同“变色龙”一般闪烁跳跃, 矛盾极端, 可以从史景迁所说“文化利用”(culture use)角度理解, 也就是西方观察者们试图充分“利用”中国文化的他者作用, 作为对自身文化反思批判的重要依据^[4]。

2 孟旦学术谱系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之一的儒家哲学在西方得到正面刻画与传播, 这些来自异域文化的认知和表述对儒家形象的塑造起到了一定作用。马可·波罗将 13 世纪的中国富庶社会和开明政体归因于孔子思想指导下的“哲人王”统治, 明清时期的欧洲传教士汉学家闵

明我(Domingo Navarrete)、金尼阁(Nicolas Frigault)等人向西方建议效法“孔教乌托邦”的仁政与德治。19 世纪上半叶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和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表层描述性解读开美国儒学研究之端绪, 将儒学视为真正学科进行探索的是师承夏德(Friedrich Hirth)、劳费(Berthold Laufer)的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等人, 推动现代美国中国学的生发(张舜清, 2021),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狄百瑞(又译“狄培理”)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创美国新儒家学派(Neo-Confucian School), 沿袭宋明理学的思想源流, 受 20 年代熊十力创立的“新儒家”体系(现代儒学观)影响较多, 与冯友兰、钱穆等新儒家代表交游甚密, 之后美国儒学研究出现了波士顿学派和夏威夷学派, 前者的建立以 2000 年南乐山《波士顿儒学: 晚期现代世界可移植的传统》的出版为标志, 后者以成中英、安乐哲和郝大维(David L. Hall)等人为核心。

孟旦的学术谱系中, 他与狄百瑞和安靖如组成一个学术共同体。狄作为主张东学习用, 世界大同的大儒, 推进新儒家学派学术积累, 得到学派内外的自觉认同。狄与密西根大学东亚系荣休教授、著名汉学家孟旦形成师承关系, 1957 年以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为地缘纽带, 开始指导孟开展汉学高层次领域研究, 孟将安娜堡(Ann Arbor)的居所命名为“孟寓”彰显其人格品质上的师承关系, 根据 The Academic Family Tree (<https://academicfamilytree.org/>) 学术家谱网以及孟本人口述, 两者共同导师为约翰·杜威(John Dewey), 使两者理论带上实用主义的烙印。安靖如是卫斯理安大学东亚研究弗里曼讲席教授、全球学中心主任, 2016-2017 年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任博古睿研究员(Berggruen Fellow), 他接受美国新儒家和现代儒学的当代学术传承, 在美国新儒家学派代表之一的孟旦指导下获密歇根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 曾称赞道: “门下硕博群体数量可以体现对下一代学者的影响力, 从这个角度来讲, 目前美国儒学研究最具影响力的三位学者是倪德卫(David Nivison)、孟旦、安乐哲。”

3 君子的现身与儒学的登场

3.1 君子的现身

君子在《诗经》、《尚书》等古籍中通常被视为一种贵族身份, 在儒家经典, 德行兼备、学养并重的理想人格则以“君子”为表征, 而在该共同体的跨文化解读, 基本以重视家庭伦理、克己复礼、和谐性善的形象再现,

这也是狄-孟-安赓续流动的理论脉络之一, 尽管在许多译介中, 译者注意到其与己文化中的希伯来先知存在诸多共通之处, 因此译为“scholar”或“philosopher”, 但狄-孟-安实际上已经刻画出道德至上的君子形象。

君子的家国同构观中, 家国理念不但构成君子文化的根基, 也是君子实践德行的基本领域。家爱和家族道德伦理观不仅贯穿始终, 也成为推己及人、互惠互利等仁爱观的发端, 新加坡、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无不深受儒家经典影响。家庭是中国社会最根本、最基础的制度, 儒家五伦尤以家庭制度为主^[5], 安氏同样认为, 暂且不论一些家庭是否是严格意义上的儒家, 他们仍然是践行儒家操守、信奉儒家理念的中心^[6]。而孟旦借用朱熹的家庭比喻, 将家视为一种形象、隐喻, 如“流水”从源头对个体进行自我净化, 作为人与集体、社会、国家的中介, 引出国同构的理念, 也可以连接世间万物, 反映出“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思想, 消解西方主客观分离的二元对立。现代生物学的研究支持儒家以孝悌为根本的仁爱观, 进而发展出等差之爱 and 利他主义。儒家把爱亲作为仁爱之始, 倡导推己及人, 强调移情的必要性, 从而进入“泛爱众”的理想状态^[7], 这与《西铭》中基于宇宙本源的仁孝伦理相照应, 最终使人和万物平等地生存在一个相互交织的大家庭。

君子行礼以率天下, 高尚的道德规范和传统礼仪准则由君子实践, 安氏将“礼”译为“ritual propriety”, 认为礼包含一系列制约人际交往的社会规范, 而非庄重的仪式, 对一个人的行为有明显且直接的影响, 可以塑造、改变、滋养情感并引导情感潜流^[8], 鉴于西方对儒家道德伦理学研究的话语缺位现状, 他建议西方应多向现代儒家的道德伦理学学习, 特别是牟宗三的克己慎独理念。狄氏将朱熹的克己复礼说作为行为准则, 译作“Subduing oneself and retuning to decorum”, 视“decorum”为规范人和社会之间的客观标准, 当私欲让位于公利, 真正的人格就会显现^[9], 借尧舜禹 16 字心法“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 允执厥中”作为私欲与人性中纯洁的道德首位发生冲突时, 培植心性的标准, 即区分私欲和公利, 遵循仁、理, 回归中庸, 这并不是压抑自己的手段, 而是释放内心的善^[10]。狄氏看重宋明理学, 甚至高于启蒙运动, 提醒人们“自我收缩”, 即自我反省和学而为己, 为使自身考虑到周围环境和人的因素, 继而符合礼的要求, 达到和的境界, 孟旦根据《中庸》教导人们需要培养“时中感”(timelines), 在克己的途中遵循内在控制, 做到不欺

暗室、自省自察、诚意正心^{[7][10]}。可以看出君子自膺大任, 具有感天应地的内在超越精神, 将矫正混乱失序、重建理想秩序作为使命。

君子四德“元亨利贞”, 利, 和也, 儒家提倡的文明和文化以家庭中普遍存在的情感和和谐为特点, 同时礼是和的基础, 是通往和谐的进路。理论上讲, 中国历代贤明君主正是以这种行为准则继往开来, 圣人尧避免使用武力和强迫, 通过慈爱的形象施加统治, 辐射到整个人类家庭^[12]。不同于西方神学基督教的宗教环境, 趋善论的中国文化语境没有“人天生自私”的原罪论, 且关于利他主义的现代生物进化理论也支持孟子的人性论中人心天然和谐向善的观点, 即如流水一样天生向善的本质: 良能, 以及天生的道德意识: 良知^[13], 可以看出和谐向善构成中国人心人性的基础。孟旦同样强调情感意动对实现和谐的作用, 提出“心灵簇”(clustering of mind)的概念以表达中国特有的思维模式, 将认知与情感、事实与价值相关联, 衍生出的认知、价值、情感统一更能实现人的可塑性^[14]。设想存在可能的冲突, 儒家也能尽可能地寻求和谐, 这是儒家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之一, 没有一个音符的乐章, 没有一种材料的菜肴, 当差异得到互补, 互相接纳, 和谐就会产生, 即使很难像圣人那样应对冲突, 安氏也建议通过效法圣贤, 找到一种方法来认识和尊重冲突中存在的不同价值观^[15]。

3.2 儒学的登场

2010 年和 2011 年, 李泽厚相继发表《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中国哲学如何登场》两本谈话录, 呼吁在思想理论上“视西人如帝天”的时代可以结束了, “现在是中国哲学登场的时候了”。这里的中国哲学指的是原创且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 中国哲学是以生活为基础, 而后现代哲学的特点恰恰也是“以生活为基础的哲学”(张汝伦, 2018), 李泽厚同样认为, 西方现在的“后哲学”, 其实就是从思辨的、狭义的形而上转变到以生活为基础的广义哲学, 显示出对人的生活价值、意义的追求。中国传统儒家哲学是一种“生活哲学”、“实践哲学”、“伦理哲学”(陈秉公, 2017), 对现实生活给予情感关怀, 重视社会生活中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

然而, 安靖如在 2018 年的一篇访谈中提到, 美国的东亚研究将佛学和道家思想置于主要地位, 但目前为止儒家哲学备受冷遇。列文森的“剃刀”也曾对准儒学, 将其视为应该放在博物馆的陈列, 狄百瑞等汉学家批评了这种观点以及类似言论, 认为宋明理学实际上

倾向于更新和改革, 朱熹调和公众哲学与自我之间的尝试, 由“学而为己”推向公共空间体现的自愿、互助、协作精神或许可以被视为‘后现代’的思考。狄氏在为儒家哲学正名的过程中发现自由传统、人格主义等成分与今日西方价值相契合, 强调《论语》已经受时代检验, 关切人类恒久普遍的核心价值, 不像晦涩的西方哲学那样束之高阁, 这种在日常生活规范和人际交往基础上展现出的仁爱精神在今天仍具有普适性, 由此观之, 儒家哲学的世界意义得以彰显。

孟旦借现代生物学理论、脑神经科学和进化心理学论证儒家哲学不落时的原因, 儒家伦理中的利他主义并非基督教提倡的背负沉重枷锁的无差别之爱, 而是基于孝悌的等差之爱, 从而提高自己以及关系网中基因的延续性, 但也绝非仅限于血亲之爱, 而是能够达到推己及人、仁者爱人的基础。孟子学说与现代生物学家都认同利他主义以家族为起点向外扩散。

具体说来, 利他主义 (altruism)、关爱 (love)、同情 (compassion for suffering)、移情 (empathic care) 等道德情感在跨文化价值中处于核心位置, 这些价值来自 1) 主体或心理舒适, 2) 家庭之爱。在当代西方伦理学, “健康和舒适”是基本道德价值讨论中常常提到的话题, 论语中“仁者安仁”已提到这一点, 仁爱达到自觉时, 人们便会心满意足地居于“仁”^[16]。此外, 孟氏认为, 孟子思想就其本身来说更贴近人性, 伦理原则和社会运行与人性并行不悖时, 人们才乐意身体力行, 社会才长久发展, 孟氏关于伦理规则和选择的证明以及以人性为基础的观点可以通过生物实验室或者罗伯特·阿克谢罗德这样的博弈理论家反复加以验证^[17]。更进一步, 孟氏令人信服地提出儒家思想可以作为一种经验性的理论, 取代目前主导西方伦理话语中的义务论和功利主义理论 (deontological and utilitarian theories), 因为功利主义过度强调个体重要性, 将每个人的利益和自由等同视之, 忽视了本性中偏向亲属而非陌生人的天然倾向, 康德的义务论也忽视了情感在任何有效的道德审议和行动中所起的作用。孟也指出, 孟子思想可以发展出一套西方伦理教育并指导行为模式, 在孟子思想的视角下可以更好地理解现代认知科学中关于自我的研究成果^[18]。孟氏跨越了相对主义下的文化不可通约性, 让儒学的外在超越性和世界意义再次加深和丰富。

安靖如不仅把儒家哲学当成一种可以调整的现代哲学, 而且提出“进步儒学 (progressive Confucianism)”概念, 高举修身齐家之道, 呼吁在现代生活中体现仁义

礼智信的基本价值, 当代哲学应该认真解读“圣贤 (sagehood)”的涵义, 这又以实现和谐为基础, 比如如何应对伦理冲突, 儒家哲学中精神练习 (spiritual exercises) 的现代思考等, 创造更多与西方哲学的对话空间。在安氏看来, 儒学甚至已经超越自身, 影响会进一步扩大, 不再仅仅是一种哲学传统^{[6]260-264}。

4 范式参照

4.1 道德修养和伦理规范

儒家哲学的域外解读和经典今说恰好能够体现国家形象“他塑”的一大功能, 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提供实践样本和范式参照^[19]。儒家哲学作为构成世界哲学原材料, 即使遭到黑格尔的片面曲解误读, 仍是柏应理、闵明我等耶稣会士以及莱布尼茨、伏尔泰、傅尔蒙等启蒙思想家竞相关注学习的中心。柏应理等人在巴黎编译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1687) 完整翻译并解说“四书”中除《孟子》外的其余三部, 学术界深入研究了欧洲的反映, 发现欧洲近代思想并非仅在其内部孕生, 在摆脱地中海后接触的其他文明思想中, 中国文化对他们影响最大^[20]。闵明我在著作《中华帝国纵览》的经世致用思想希望中国清明富强的形象能促进西班牙革新, 扭转西班牙颓势, 减田税惠农民的建议给法国重农学派带来积极影响。17 世纪传教士们切入中国儒家道德观的角度各异, 但几乎都认为中国人的幸福主要是靠道德修养和伦理规范实现, 因而刺激更多理性主义者反观自身。

莱布尼茨和沃尔夫高度重视儒家哲学的其中一个原因源于宗教。新教徒莱布尼茨主张世界主义, 厌恶宗教战争, 崇尚一种以道德为标准的自然宗教, 在著作《中国近况》中提到中国的德政远超西方, 是孔子的教导让人民幸福安定。沃尔夫是莱布尼茨哲学的继承者, 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深刻影响德国启蒙运动, 沃尔夫在孟旦之前就已认识到儒家道德贴近人类本性, 合乎自然道德, 认为儒家伦理观能教导人们理性区分善恶, 而非取决于上帝感召。

4.2 以人为向度

(1) 就个人而言

启蒙主义推动了西方现代化进程, 但也引起理性与信仰、个人与群体、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对立的伴生症结, 价值理性的缺失使人陷入精神世界与意义世界的双重迷失, 过度强调个人自由和竞争, 导致个人主义盛行, 与集体主义形成严重对立, 现代化之后人的主体性再度丧失, 西方社会不得不陷入二律背反的境地。马

尔库塞批判技术理性下的资本主义将人扭曲异化成“单向度的人”, 技术理性的二重性既增长人的力量, 又加速人的衰弱, 使人变成原子个体、生产机器、肉体代码, 极权化的技术统治侵入人的内在心理本性。价值失落、道德失范等随之而来的现代病囿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桎梏, 无法自我疗愈, 进而倒逼西方主体迫切寻求中国智慧, 从马克思主义和儒家入本主义角度深入分析并批判西方现代病, 不妨从现代儒学角度加以解决, 因为儒家伦理中成为圣贤的自我修养、人文关怀和入世精神、仁与礼的动态平衡等都体现出当代价值,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1]。上个世纪西方哲学家罗素等人意识到民众罹患的精神现代病, 对西方贫瘠的人文空间感到失望, 遂问道中国寻求新的希望。

经典学说不仅能避免西方文化的思想殖民, 也能展现出新的世界图景, 狄百瑞在几部著作中梳理过作为文化资本的儒家思想和其他东亚文化的发展脉络, 并将其应用于现代发展。狄氏已经察觉到新技术带来的灾难性破坏和极权主义的威胁, 如果忽视思想遗产, 不唤起个人意识, 任何秩序都无法持久, 因此需要借古开今, 进行道德训练。

在个体层面, 西方社会狭隘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缺少“群”、“集体”观念, 造成人的过度张扬和过度自由。新儒家强调的人格修炼和社群调和能够弥补这一缺陷, 狄氏借“社学”、“乡约”在中国不同时期的发展演变说明儒家在社群生活中恪守的理念, 阐述群/集体在家国之间的纽带作用, 以及实现个人自由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统一的作用。《荀子·王制》提到的“和则一, 一则多力, 多力则强, 强则胜物”表明人和牲畜的不同在于人能根据道义和礼法结成群体, 进而和谐强盛, 战胜外物。这种缺失引发的极端事件、过度竞争和矛盾冲突等等不良后果依然可以从儒家思想中找到一些解决途径。狄氏强调, 朱熹“为己之学”、“正心诚意”的理念都是通过内心的训练达到中正平和, 而儒家自由主义可以弥补西方思想因子的缺陷, 为西方社会激进的政策提供良方。孟旦指出, 竞争意识在西方个人主义中被过度吹捧, 暗示自我与群体、自我与自然之间的两级对立, 引发被约束的紧张感, 生存的压力使竞争和征服成为必要, 但是要尽可能地了解其他人和事物, 产生同理心(sympathy), 运用孟子和新儒学所说的心灵媒介打破阻碍关心他人、采取利他行动的心理障碍, 但并不意味个体与他人界限的消失^[22]。对于此起彼伏的斗争冲突, 狄氏认为朱熹“理一分殊”的思想在如今仍然奏效, “月印万川”最早出自唐朝高

僧玄觉《永嘉证道歌》中“一月普现一切水, 一切水月一月摄”, 朱熹借此印证“理”是万理之源, 如月在天空光披万表, 万事万物都有理的存在, 从中体现的普遍与特殊、统一与差异的关系就是告诉外界, 要从多样性和差异性的表象中寻求人类的共同价值。

(2) 在制度层面

竞争激化使诞生在资本主义早期的西方政府“守夜人”形象覆灭, 基于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民众作为契约个体与国家呈现委托代理关系, 但困于“影子政府”、“金主政治”, 不能保证选出最优代理人, 而在中国, 人民作为道德个体既是权力的委托者, 也是权力的所有者, 从而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普林斯顿大学马丁·吉伦斯(Martin Gilens)和西北大学本杰明·佩奇(Benjamin Page)在2014年通过2000份民意测验, 分析国会20年以来讨论过的1799个政策问题, 发现美国普通人的偏好对美国公共政策的影响几乎为零, 没有统计学意义, 只关注特定群体的利益使普通人有了向下的自由, 政府时常失灵以及只关注民众外在的偏失行为让孟旦感到失望, 他强调应该学习中国的群本位价值取向, 且政府应像父母一样不仅培植人民心性和思想, 也能妥善有效地治理社会, 这种价值取向和整体观在他看来包括对社会等级秩序的遵从, 个人与整体的和谐以及自我与自然的统一。安靖如也用党派姿态和自以为是形容目前的美国政府, 建议美国政府需要珍视儒家传统美德中的谦卑和正直, 摆脱将儒家中的谦卑真诚视作软弱顺从的错误观念, 从而使治理卓有成效^[23]。在洛杉矶博古睿哲学和文化研究中心(Berggruen Philosophy and Culture Center)的一次研讨中, 安氏和夸梅·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等其他政治哲学家和学者一致认同应该为社会等级秩序做辩护, 等级秩序在西方时常遭受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的攻击, 但纯粹的平等似乎不现实, 重点是建立好的等级秩序, 儒家的等级制度以互惠互爱为标志, 为了追求美好生活, 利用等级秩序让能者居其位, 位卑者得到提携, 家长式的等级制不仅能促进个人自主, 也能带来社会和谐^[24]。

近现代的西方和资本主义因追求现代化而陷入增长狂热, 私欲压倒公义、金主吞噬民主, 步入黑色发展的现代化, 生态裂痕不可避免, 漠视人的基本精神和情感,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失去平衡, 甚至将科技与人文割裂, 使人超越现实的理想被现实超越。现代病的解决之策需要参照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的儒家伦理精神、道德理性、人文内涵、整体思维、实用价值, 以及与时俱

进、兼收并蓄的特点。这些思想也在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论述中被进一步深化,他认为应对工业主义、集权主义等现代性的后果,我们不能放弃对乌托邦的追求,要使其与现实保持平衡,必须恪守马克思主义原则,实现工具的人道化^[25],进而回归以人文主义为本的心灵向度。

5 结语

孟旦师承狄百瑞,传道安靖如,传统儒家思想和新儒家学说作为该学术共同体的一脉相承的学缘,在他们的独舞和共振中已经建立起中国儒家形象的价值认同,其中,君子形象以家观念为核心,向内克己复礼、学而为己,向外延伸关爱、追求和谐和自身成圣的超越;儒家哲学是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中国文化坐标,对于异质文明起到范式参照和明志镜鉴之功用,更进一步,这些经典思想经过现代发展和转换体现出对社会发展病症的疗愈作用。

梁启超批判性的文明融合论或许能带来新的启发。他实地考察战后欧洲,发现其隐患并未消失,民生凋敝,暗潮涌动,科学万能的大梦已将西方引入歧途,仁义道德的缺位使“抢面包吃”成为全部目的,梁反思轴心时代的中国古典文化,认为对西方文明缺陷具有悬壶济世之效,沿袭孔子“进行赞化”、“自强不息”,老子“各归其根”,墨子“上同于天”开辟理想与实用一致的境界,“拿西洋文明扩充我们的文明,又用我们的文明去补助西洋文明,然后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新文明。”^[26]

参考文献

- [1] 邹雅艳. 13~18 世纪西方中国形象演变[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290-295.
- [2] 邓林. 汉学家高罗佩跨语际表述中的中国形象[EB/OL]. (2023-05-15)[2024-07-18]. 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305/t20230515_5637832.shtml.
- [3] 徐宝锋. 中国国家形象“他塑”的汉学路径与话语建构[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24):47-53.
- [4] 谭旭虎. 镜像与自我: 史景迁的中国形象建构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235-242.
- [5] 狄百瑞,朱学贵. “亚洲价值”与儒家之人格主义[C]//国际儒学联合会. 国际儒学研究(第六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4.
- [6] Angle S C. Sagehood: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Neo-Confucian philosophy[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9:261.
- [7] 孟旦,庞琳,刘燕. 当科学为价值有涉的事实作辩护[J]. 世界哲学,2020,(04):121-133+161.
- [8] Stephen C. Angle & Justin Tiwald, Neo-Confucianism: A Philosophical Introduction[M]. Polity, Malden, 2017: 134-135.
- [9] Stephen C. Angle. Virtue Ethics,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Need for Self-Restriction[A]. Brian Bruya. The Philosophical Challenge from China[C]. MIT Press, Cambridge, 2015:159-160.
- [10] Wm. Theodore de Bary.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China[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3: 24.
- [11] Wm. Theodore de Bary. Zhu Xi and the Four Books[A]. Wm. Theodore de Bary. Finding Wisdom in East Asian Classics[C].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11: 197.
- [12] Wm. Theodore de Bary. Nobility and civility: Asian ideals of leadership and the common good[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4:64.
- [13] Behuniak J. NATURALIZING MENCIOUS[J].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2011,61(3):492-515.
- [14] 刘燕,庞琳. 儒家人性论及其现代价值——美国汉学家孟旦教授访谈录[J]. 哲学动态,2023,(06):117-125.
- [15] Stephen C. Angle. Growing Moral: A Confucian Guide to Lif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22:85-88.
- [16] 孟旦,安延明. 我的“格物”[J]. 世界哲学,2016,(02):5-16+49+160.
- [17] 孟旦,安延明. 一种证明伦理规则的现代方式: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孟子和当代生物学[A]. 哈佛燕京学社. 儒家与自由主义[C]. 三联书店. 北京. 2001:209.
- [18] Donald Munro, A Chinese Ethics for the New Century: The Chi'en Mu Lectures in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Other Essays on Science and Confucian Ethics[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Hong Kong, 2005:8-66.
- [19] 汪长明. “一带一路”传统文化交流塑造中国国家形象[N]. 社会科学报,2024-02-22(006).
- [20] 张西平. 儒家思想在欧洲早期传播的经典之作[J]. 读书,2011,(06):50-57.
- [21] 杜维明. 全球视野下的精神人文主义[J]. 中国文化研究,2023,(03):50-56.

- [22] Donald J. Munro, Individualism and Holism: Studies in Confucian and Taoist Values[M].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1985:20-22.
- [23] Stephen C. Angle & Michael Slote, Virtue Ethics and Confucianism[M]. Routledge, New York, 2013:181.
- [24] Stephen C Angle, Kwame Anthony Appiah, Julian Baggini and others. In Defence of Hierarchy[EB/OL]. (2024-09-20)[2017-3-22]. <https://aeon.co/essays/hierarchies-have-a-place-even-in-societies-built-on-equality>.

- [25]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89-96.
- [26] 梁启超. 梁启超游记[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53-57.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 (OAJRC) 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